清代理学

略论清顺治年间程朱理学的涌动

史革新

[**摘要**] 程朱理学并非普通的学术派别，而是一种集政治性、学术性及伦理教化功能为一体的社会政治学说与意识形态。顺治年间，程朱理学就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有所发展，不断集结着自己的力量，呈现出复兴之势，为其在康熙朝的鼎盛发展打下基础。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在清初走向复兴，重要的因素固然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然而，它在学术方面的影响与活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 程朱理学　顺治年间　理学士人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6) -04-0028-08

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Upsurge of the Cheng - Zhu Neo -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Shunzhi Period of Qing dynasty

Cheng - Zhu Neo - Confucianism was not an ordinary academic school, rather it wa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s well as an ideology that combined political academic, ethical and humanistic functions. During the Shunzhi reign, due to the ruler's support, there was a marked development of Cheng - Zhu Neo - Confucianism. Cheng - Zhu Neo - Confucianism steadily strengthened and producing a revival, that built the foundation for prosperous development in the Kangxi reign.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Cheng - Zhu Neo - Confucianism's revival was the robust support of the Qing rulers; however, its academic influence and vigor were also noteworthy.

明中叶后，陆王心学盛行，程朱理学相对沉寂，但到清初，程朱理学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又呈现出复兴的态势。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复兴是传统儒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谈到清初理学复兴，人们关注较多的是程朱理学在康熙朝的兴盛，而对其在顺治年间的涌动则鲜有论及。其实，程朱理学在顺治朝就已经有不少复兴的迹象，从清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到朝野理学士人的跃跃欲试，都传达了理学复苏的信息，并为其在康熙朝的振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程朱理学在顺治朝涌动的原因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中的主流派别，形成于宋代，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元代时，程、朱之书被列为士子科举考试的读物，程朱理学被奉为儒学正宗，成为学界的主流学派。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其命运却出现了大起大落。明初，由于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的大力表彰，程朱理学被定于一尊，成为学界显学。儒臣解缙曾对朱元璋说：《说苑》、

[**收稿日期**] 2006-4-30

[**作者简介**] 史革新（1949-）、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韵府》、《道德经》、《心经》等各家书籍“抄辑秽芜”，于治国“略无可采”，于国家最有用的学问是孔、孟、程、朱之学，即“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①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都对程朱理学情有独钟，大加提倡。朱棣在永乐十二年（1414 年）命儒臣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书籍，开启了官修理学书籍的先河，使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学界一度出现“宗朱者盖十八，宗陆者盖十二”的局面②。然而，到明代中叶，程朱理学因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而受到猛烈冲击，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如史书所载：

> 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③

王学的兴起固然给当时沉闷的学界带来新鲜气息，但其流行也出现了束书不观、说虚谈玄的弊端，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因此，在王学盛行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纠正王学之弊，遭受王学压抑的程朱理学复为学界所重。

王阳明尚健在时，学宗程、朱的罗钦顺就公开对其学说提出质疑，致书辩难。稍后，陈建著《学蔀通辨》进一步批评王学。所谓“学蔀”是指蒙蔽、侵扰正学的各种“异学谬说”。陈建表示：“慨然发愤，究心通辨，专明一实以抉三蔀。”④这里所说的“三蔀”即一为佛学，二为陆九渊之学，三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后者即指王阳明的学说，为他所抨击的重点目标。罗钦顺、陈建等人的言论对晚明学界反思批评王学、呼唤朱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活跃在晚明政坛学界的东林派也是倡朱斥王的一股力量。东林派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是不满阉党、标榜气节、试图刷新朝政的士大夫。他们的基本学术倾向是宗程、朱而诋陆、王，反对弃儒入禅的王学末流。明万历年间，顾宪成在故里无锡与高攀龙一起重建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是北宋理学家、“程门四先生”之一的杨时讲学之地，重建东林书院显然是为了发扬程朱理学的传统。顾宪成在《请复东林书院公启》中表示：

> 而今而往，有能冥弃心宗如当年之在剑南，一传而为罗豫章，再传而为李延平，三传而为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统者乎，亦为先生之赐。⑤

高攀龙认为要继承孔子就必须大倡朱熹之学，指出：

> 删述《六经》者，孔子也。传著《六经》者，朱子也……孔子之学惟朱子为得其宗，传之万世而无弊。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⑥

东林学派集中了一批学宗程、朱的学者，在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同时，鼓吹尊朱黜王，成为晚明提倡程朱理学的中坚力量。

王学末流不仅受到非王学流派学者的抨击，而且也引起王学中人的不满，使其中一部分人为挽救王学而求助于朱学，走上调和朱王的折衷之路。蕺山学派领袖刘宗周即如此。刘宗周早年曾治朱学，中年之后改肄阳明之学，但又对其偏颇不满，于是提出“慎独”为宗旨的学说以补救之。他认为良知说并非圣学之根本，圣学根本乃是“慎独”，曾说：

> 《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⑦

在阐述“慎独”之说时，刘宗周吸收了程、朱“诚敬”的说法，援朱人王，使两家调和，以补救王学的弊端。无怪他的弟子黄宗羲说：“先生宗旨为慎独。始从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精微，愈平实。”⑧

由上可见，程朱理学在明已呈复兴之势，宗程、朱者大有人在，其中一些人成为清初学界倡导程朱理学的活跃分子。

清初，在明末已经有所抬头的程朱理学在朝野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具备了比较充分发展的社会条件，最终走上复兴的道路。程朱理学并非普通的学术派别，而是集政治性、学术性、伦理教化功能为一体的社会政治学说。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在清初走向复兴，首要的因素来自于政治方面，即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

顺治时，南方的反清势力依然活跃，局势

动荡不宁。清朝统治者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把各地的反清势力镇压下去，实现局势的稳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朝最高统治者在顺治三年（1646）三月会试殿试时就国家“除乱为治”的问题征询应试士子的意见，清帝制策云：

今欲早成混一，衽席生民，巩固鸿图，克垂永久，以亿万年敌天之休，遵何道而可欤？……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⑨

顺治帝后来还说：“朕孜孜求治，夙夜不遑，十有五年于兹矣”⑩，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孜孜求治的迫切心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清统治者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提了出来，加以推行。顺治十年（1653）四月十九日，顺治帝在给礼部的上谕中指出：

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⑪

“崇儒重道”四字出现在清廷发布的上谕之中，表明它已经被统治者确立为实行“文治”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包括尊崇孔子及儒学、推行科举、起用儒臣、实行经筵与日讲、编印颁发儒学书籍等具体措施。其中很多措施的制定都有利于程朱理学的开展。

顺治初年，清统治者就把理学书籍规定为学校教育的必读之书，明令天下士人诵读。国子监规定入监生员所学内容是“两厢及六堂讲《四书》、《性理》、《通鉴》，博士讲《五经》”⑫。顺治九年（1652），清廷在为各直省儒学明伦堂颁发的卧碑文中要求各省学政“将《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令生儒诵习讲解。”⑬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加强程朱理学在教育中的思想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顺治朝统治阶级中就已经显露出若干推崇程朱理学的迹象。一是顺治八年（1651）十月秘书院检讨徐必远奏请编译《大学衍义》，称：

古今帝王必留心圣学，乃能兴起太平。臣自八月入署，见所翻《通鉴》渐次将成，虽治乱之迹可稽，而圣学精微，尤期纯备。惟宋臣真德秀《大学衍义》于天命人情，身心家国，咸撮要领。伏乞敕谕儒臣，译呈睿览，必能广格心之益，而观道化之成。⑭

真德秀是程朱理学的正宗传人，所撰《大学衍义》体现了正宗的程朱理学的观点。徐必远的建议显然是要清帝以程朱理学为“圣学”根本，按照它的精神来实行统治。只是顺治帝未予重视，翻译《大学衍义》的工作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才告完成。

二是顺治十六年（1659）十月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奏请销毁毁谤《四书》的书籍，奏疏言：

《六经》之道，炳若日星。《四书》所以发明《六经》，而《集注》又以发明《四书》，为功最巨。臣从坊刻中见有《四书诸家辩》，又有《四书大全辩》，皆以讥讪先贤，崇尚异说，获罪名教不小，乞敕部毁版，庶先贤传注，不为异说所夺，而学术大醇，人心可正矣。⑮

清政府非常重视他的陈奏，表示：

滥刻《四书诸家辩》、《大全辩》等书，畔道驳注，应令焚毁。并饬直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⑯

这一事件至少反映两个问题，其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认同杨雍建关于朱熹的《四书集注》于发明儒学“为功最巨”的观点；其二、清政府不允许毁谤《四书》的书籍存在。这反映出清初统治者中的崇程朱理学的政治倾向。

上有所求，下有所应。一班儒臣上书进言，声称要谋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就必须讲究“圣学”，即崇奉程朱理学。清朝统治者所作的这一选择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纲常名教是维系国家的命脉，支撑朝纲的精神支柱，也是达到“致治”的重要途径。而程朱理学比原来流行的儒学更加政治化、伦理化，恰恰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这种政治需要。程朱理学再次被封建统治者所看重自然是顺理成章

的事。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的支持与否往往成为一个学派、一种思想兴衰的重要因素。清统治者的扶持态度成为程朱理学在清初复兴的重要政治条件。

在学术方面，清初学界正处于学术思潮发生转换的时期。在理学内部，王学在清初的影响尚在，而宗程朱者延续明末对于王学进行批评，或调和朱、王，或由王返朱，一时成为趋向。梁启超说：

> 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自然之数也。因为几百年来好谭性理之学风，不可猝易，而王学末流之弊，又已为时代心理所厌，矫放纵之弊则尚持守，矫空疏之弊则尊博习，而程朱学派，比较的路数相近而毛病稍轻。故由王返朱，自然之数也。⑰

而在学理上，程朱理学自有一套与王学不同的思想主张、治学宗旨及方法，对于纠正王学末流偏颇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如王学束书不观，朱学提倡读书；王学“师心自用”，朱学“主敬诚意”；王学讲“知行合一”，朱学讲“知先行后”。朱学的这些主张很多都成为士人清算王学的思想武器。这样，王学的衰落、朱学的兴起，王学为朱学所取代，就成为清初学术演变的“自然之数”。当然，这种学术更替，严格说来，还是自宋、元、明以来理学内部学派冲突更迭的一种自我调整。

二、顺治年间程朱理学的涌动

顺治朝，促使程朱理学复兴的一些基本条件都已在形成之中，表现为：一是明末入清的尊朱学者及其影响；二是从王学营垒中不断分化出尊朱或者主张调和程朱、陆王的学者；三是清朝教育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基本沿袭明制，有利于造就新的理学士人。其间，跻身于官场与散落在民间的宗程朱理学士人的积极活动，形成“朝野互动”的局面，铺垫了通向程朱理学复兴的道路。

首先，明末尊朱的学者在清初依然固守程、朱壁垒，成为复兴程朱理学的重要力量。其中影响较大者有东林学派余脉。顾宪成、高攀龙去世后，因遭阉党打击、明清鼎革之变，东林派一度出现衰落之势。清初，在高世泰、高愈、张夏等人的努力下，东林派后继者再度活跃起来。然而，由于时过境迁，清初的东林后继者已经无法恢复昔日的辉煌景象，既不“讽议朝政”，又鲜“裁量人物”，只恪守“倡正学，维风化”的宗旨，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讲学授徒的范围内。清初的东林余脉不仅保持着一定的学者队伍，而且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为程朱理学的复兴壮大声势。直隶人刁包原来向慕孙奇逢讲良知学，后“读高攀龙书，大喜，曰：‘不读此书，几虚过一生矣。’”⑱遂改宗程朱理学。除东林学派余脉外，在其他地区亦有不少讲程、朱之学者，如江南有陆世仪、朱用纯等；直隶有刁包；山西有范鄗鼎、李生光、党成等；陕西有李因笃；浙江有张履祥、应撝谦、沈昀、吕留良；安徽有汪佑、施璜、施闰章；山东有刘原渌；江西有谢文洊；福建有张鹏翼等。梁启超在谈到清初程朱学派时说：

> 清初因王学反动的结果，许多学者走到程、朱一路，即如亭林、船山、舜水诸大师，都可以说是朱学者流。自余如应潜斋（撝谦）、刁蒙吉（包）、徐俟斋（枋）、朱柏庐（用纯）等，气节品格能自异于流俗者不下数十辈，大抵皆治朱学。故当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以前，朱学不能不说是中间极有力的枢纽。⑲

其次，从王学中人分化出来的宗朱学者，成为程朱理学得以发展的又一支重要队伍。王学曾是明中叶后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直到清初还有相当的影响。名扬一时的清初“三大家”即孙奇逢、黄宗羲、李颙等人，无一不是出自王学的儒学巨擘。然而，在时代变化和王学思潮受冲击的情况下，宗王学者中的一部分人转到程、朱方面，充实了程朱理学的队伍。

以孙奇逢为首的北学本为王学重镇，但孙奇逢在学术上采取了调和程朱、陆王的立场，使该派学术思想的走向出现歧异，既有固守陆、王之学的，也有力主程朱、陆王调和的，还有转而主程、朱的。孙奇逢弟子耿介“一意讲明圣学，爱程子‘内主于敬而行之以

恕'，名其堂曰敬恕"[20]，创办嵩阳书院讲授程、朱之学。申涵光受其师孙奇逢影响，论学持平，于朱学多有吸收，曾说："主静不如主敬，敬自静也。"又说："求放心只是敬。"[21]窦克勤（孙奇逢高徒汤斌之弟子）尝著《理学正宗》，称："道统正传，必以宋儒为断；而宋儒称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为归。"[22]孙奇逢以后，王学弟子分化明显，讲程朱理学的学者逐渐多了起来。

以刘宗周为首的浙江蕺山学派在清初也发生了分化，导致一批学宗程朱的学者脱颖而出。陆世仪、张履祥为其中的代表人物。陆、张二人都曾受学于刘宗周，一度心仪王学，但后来都改变了治学趣向，转攻程朱理学，成为力主程、朱的一代名儒。唐鉴以他们提倡正学作用甚大，并尊二人为清代儒学道统的"传道人"[23]。

其他先从王、后尊朱的学者大有人在，如江西南丰学者谢文洊曾"读王畿及王守仁书，遂与友讲阳明之学"[24]，大悔，后学宗程、朱，辟程山学舍，讲学授徒。其弟子甘京、黄熙、封濬、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等皆学有成就，时号"程山六君子"。担任康熙帝经筵讲官的曹本荣之学"从阳明致良知入"，后折中程朱、陆王，讲求"穷理尽性之学"[25]。江西庐陵学者张贞生亦"初阐阳明良知之说，其后乃一尊考亭"[26]。总之，在顺治年间已有不少学者从宗王转而宗朱。

再次，由清朝教育制度培养、科举考试选拔的宗程朱理学者。清朝定鼎中原后，立即恢复各级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以笼络士人。无论是儒学教育的推行，还是科举考试的恢复，都把程朱理学作为最重要的内容贯穿其中。官方规定士人"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27]程朱理学通过官方的运作渗透于全国的教育之中，程、朱之书成为士子所必读。这种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紧密地与程朱理学结合在一起，有利于理学士人的造就。

清初宗程朱理学的名人中，有在朝为官者，有居民间未仕者。顺治朝的廷臣中已经有一些官员以讲理学相标榜，诸如孙承泽、魏裔介、魏象枢、曹本荣、熊赐履等人，进行了不少复兴程朱理学的努力。他们围绕着皇帝进学的问题，作了大量有利于突出程朱理学的引导，为日后"独尊"程朱理学造了舆论。顺治元年（1644 年），都察院承政满达海就皇帝进学问题建议："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28]次年，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也奏请清帝应"以修德勤学为首务"，"博综典籍，勤于文学"，掌握"帝王修身治人之道"[29]。儒臣们认为"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在《四书》、《六经》。扯上《四书》，就与程朱理学有了干系。翰林院编修曹本荣告诫顺治帝，"圣学"就是"二帝三王之学"，尽在"《四书》、《六经》及《通鉴》"中，必须"朝夕讨论"[30]。吏科给事中王启祚告诫顺治帝读书不要庞杂，应该阅读"有关政治"的紧要书籍：

> 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但臣闻自古帝王虽孜孜好学，要不过讲明修齐治平之道而止，非若文人之习，以夸多斗靡为长也。故卷帙虽极浩繁，而阅者无多，百家虽有异同，而采者盖寡。无论其无补于治道，正以皇上之身，万机待理，必时加爱养，以迓无疆之休。请自今除《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有关政治者，时令日讲诸臣进讲外，其余姑且缓之。[31]

在他给皇帝开列的紧要书目中，程朱理学类书籍为其首选。在朝廷中以讲理学相标榜的大臣魏裔介、魏象枢更是竭力规劝皇帝修德进学。魏裔介的《圣德与年俱进疏》、《纂修经书大全疏》，魏象枢的《圣德勤修日懋等事疏》等，也都表明了他们希望皇帝"既勤于政，复勤于学"[32]，以恪守"正学"与"君道"的强烈愿望。此外，还不能忽略孙承泽、曹本荣在顺治朝对于理学的提倡。

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山东益都人。世隶上林苑籍，亦称顺天大兴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李自成军入北京，接受四川防御使职。后又降清朝，官至吏部右侍郎，于顺治十年（1653）致仕。孙承泽因两易其主，

节操有亏，为士林所不齿。南明福王政权以降附李自成而将他定入“从贼案”，清人对他亦很鄙视。《清史列传》中的“儒林”、“文苑”列传均无他的位置，而把他贬人“贰臣传”。但在学术上孙承泽却是顺治朝提倡理学的重要人物。

早年的孙承泽向慕东林派，鄙视阉党，属于气节之士一流。以后，他所学渐广，凡性理之学、经学、史学、经世之学等无不泛览，且著述丰富，诸如《经翼》、《孔易传义合阐》、《尚书集解》、《禹贡考》、《诗经朱翼》、《春秋程传补》、《仪礼经传合解》、《历代史翼》、《水利考》、《治河纪》、《元明典故编年考》等。此外，“于理学，则有宋五先生、明四先生《学约》、《道统明辨》、《诸儒集抄》、《考正晚年定论》，皆公一力搜罗定正，手自脱稿。”[33]所著《学约》中的“宋五先生”即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明四先生”则为明代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均为宋、明两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体现出孙氏明显的程朱派学术倾向。孙承泽在士大夫中，尤其在北方士林中颇具影响，时常与魏裔介、魏象枢等相切磋唱和。魏象枢把《元明儒言录》书稿送孙承泽征求意见，“待先生玉成之”[34]。魏象枢也应孙承泽之请，对《学约》一书进行评点，称赞：“捧读新著《学约》一书，删繁就简，定补中正。”[35]孙承泽与魏裔介的学术交往亦很频繁，晚年“病间，晤魏侍郎，谆谆以阐述圣贤之学相推让。”[36]李光地对孙承泽提倡程朱、抨击王学的作为有着很高的评价，称：

> 明之季年，学无师法，横鹜别躯，议论大驳，其宗旨皆与程、朱相抵牾，虽黄、刘君子不免。先生独断然以洛、闽为宗，寻其后阶戎首，以为异学蜂兴，姚江倡之也，故于伯安学术言行，摘抉批绳，无以假借。晚于诸经皆有著述，而龈龈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者，所以翼孔也。”畿内学者，其后如魏柏乡、张武承，皆确守朱学。柏乡尽读宋人书，而武承攘斥余姚，不遗余力，其端皆自先生发之。[37]

梁启超也谈到孙承泽批评王学的作用，称：

> 他是明朝一位阔官，李闯破北京投降李闯，满洲入关投降满洲。他却著了许多理学书，摆出一副道貌岩岩的面孔。据全谢山说，清初排陆、王的人，他还是头一个领袖哩。[38]

就连恪守程朱理学原则、于学术之辨至严的陆陇其对孙承泽的学术亦不乏赞语，称：

> 孙北海学问渊深，所梓薛文清、胡敬斋、罗文庄、高存之四先生《学约》，俱有不谋而同者。”[39]

曹本荣（1622 ~ 1665），字木欣，号厚庵，湖北黄冈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曹本荣于学初宗王学，后主张调和程朱、陆王。所著《五大儒语要》将程、朱、薛（瑄）与陆、王并提，受到孙奇逢的称赞：“商、周之际，道在箕子；宋、元之际，道在许子；明、清之际，道在曹子。”[40]曹本荣在晚年愈趋尊朱。其弟子计东尝问：“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后有王阳明，使心性之学昭然天下后世。倘使两人不能先后生，则谁为天地必不可无者?”曹本荣厉声说：“宁无王阳明，不可无朱子。”[41]曹本荣是较早上疏清廷建议修“圣德”、勤“正学”的汉官。他在顺治八年（1651）的一道奏疏中说：“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则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诚宜开张圣德，修德勤学，举《四书》、《五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深宫燕闲，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敷对周详。从此设诚致行。君德既定，祈天永命，必基于此。”[42]曹本荣是顺治朝官员中宣扬程朱理学的活跃人物。

由上可见，顺治一朝在朝廷官宦中业已出现推崇程朱理学的官僚士大夫。他们当中，既有被录用的前朝降官，也有出身于清朝科举制度的后辈新进。为使程朱理学复兴，他们一方面呼吁朝廷“正君德”、“倡正学”，另一方面又著书立说，阐“正学”之幽，为程朱理学的复兴大造舆论。

清初，居民间为士的宗理学者，如上文所及的高世泰、高愈、张夏、范鄗鼎、党成、李生光、刘原渌、陆世仪、朱用纯、张履祥、应撝谦等人，都是在顺治年间力倡程朱的一方名

流。他们或执教书院，讲学授徒；或隐居山林，著书立说，固守着程朱理学的壁垒。

陆世仪在明亡后曾上书南明政府以图挽回，后则“凿池，宽可十亩，筑亭其中，不通宾客”㊸，潜心味道。

张履祥则“家故贫，以授徒为业，躬自力农桑”㊹，反思学术，始读程、朱之书。

应撝谦“既遭丧乱，自以故国诸生，绝志进取，叹曰：‘今日惟正人心，而维世教，庶不负所生耳。’乃益尽力于著书。”㊺

朱用纯人清后，“家贫遭难，授徒赡母，潜心圣学，由四子、《六经》及濂、洛、关、闽之书，昼夜探索，融会窾綮，谓学必以程、朱为宗。”㊻

需要说明的是，在顺治年间的民间宗程朱理学者中，有不少都是前明遗老，抱有浓厚的“遗民情结”。他们尽管放弃了反抗清朝的行动，但在思想感情上与新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遗民情结”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程朱理学的阐释与发挥。这也是跻身于官场的宗程朱理学士大夫与散居在民间的宗程朱理学士人之间的不同之处。

总之，顺治一朝，清统治者奉行的“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已经包含了扶持程朱理学的意义，对于朝野理学士人的活跃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宗程朱士人的集结、尊朱黜王学术走向的强化、王学营垒的分化，都是迈向程朱理学复兴的重要步伐，为程朱理学在康熙朝的兴盛作了重要的准备。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程朱理学复兴的许多重要工作，诸如程朱学理的阐释、道统学统的辨析、理学书籍的编纂等工作，大都初见端倪，尚未深入展开。更为重要的是，清朝体制内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制约着最高统治者对于治国决策的选择。这些矛盾包括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与清王朝汉化改革趋势的矛盾、体现满族传统家法祖制的诸王共议国政旧制与君权趋于集中的矛盾以及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在内。尤其是一部分握有实权的满族贵族守旧分子，思想依然停留在清入关以前的水平上，固守祖传旧制，抵制汉化改革，压抑和打击汉族官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治帝的政治态度。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去世，年幼的康熙帝即位，朝政由鳌拜等辅政大臣主持。鳌拜等满族贵族守旧势力与朝中宗程朱理学的官员之间围绕着国家政治问题及对政治文化的选择发生激烈冲突。宗程朱理学的官员们竭力争取康熙帝对自己的支持，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康熙六年（1667），学宗程朱的理学官员、时任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上了一道洋洋万余言的奏折，指陈朝政弊端，力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㊼，触怒了满族守旧派。辅政大臣鳌拜对熊氏横加压抑，欲治其罪。只是由于康熙帝出面回护，才使熊赐履免遭其祸。次年九月，熊赐履上《请除积习销隐忧疏》，在抨击朝政积弊、明确表示对于鳌拜等人秉政不满的同时，极力向康熙帝灌输程朱理学的政治理念，强调“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建议皇帝重用儒臣，讲习理学。其疏云：

> 臣请莅政之暇，间御便殿，接见儒臣，咨诹讲论，如天人理欲之分、危微操舍之界、道术是非之辨、政事得失之由，一一明晰而讨究之。凡措诸事为，徵诸政教，无一不本之以诚，持之以敬。㊽

这道奏疏再次触怒满族贵族守旧势力，“鳌拜以为劾己，意图倾害”㊾，使熊赐履又冒了一次政治风险。数月后，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团，为清朝政权进一步儒学化、实现程朱理学的复兴扫清了道路。

---

①《明史》第 14 册，411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全祖望：《陆桴亭先生传》，《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51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③《明史·儒林传一》第 24 册，7222 页。

④ 陈建：《学蔀通辨序》，清末清麓丛书刻本。

⑤ 顾宪成：《请复东林书院公启》，《东林书院志》卷十七，光绪七年刻本。

⑥《高子遗书》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卷三，清刻本。

⑦ 刘宗周：《大学古记约文》，《刘子全书》卷三十八，道光间刻本。

⑧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黄宗羲著，沈善洪、吴光整理：《黄宗羲全集》第 1 册，250 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⑨《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五，第 3 册，

21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⑩《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一六，第3册，903页。
⑪《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四，第3册，585页。
⑫《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五，第1册，545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
⑬《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第1册，5486页。
⑭《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一，第3册，478页。
⑮《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二九，第3册，999页。
⑯《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三0，第3册，1006页。
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⑱《清史列传》第17册，5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103页。
⑳窦克勤：《耿宫詹介传》，《碑传集》卷四三，《清代碑传全集》上册，2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㉑唐鉴：《清学案小识》卷十，34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㉒唐鉴：《清学案小识》卷四，94页。
㉓参见唐鉴撰《清学案小识》卷一《传道学案》。
㉔《清史列传》第17册，5268页。
㉕《清史列传》第17册，5288页。
㉖《清史稿》第43册，13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㉗《清史稿》第12册，3101页。
㉘《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第3册，42页。
㉙《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五，第3册，131—132页。
㉚《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九，第3册，546页。
㉛《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八，第3册，765—766页。
㉜魏象枢：《圣德勤修日懋等事疏》，《寒松堂全集》卷一，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㉝王崇简：《光禄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孙公承泽行状》，《碑传集》卷十，《清代碑传全集》上册，58页。
㉞魏象枢：《柬孙退谷先生书》，《寒松堂全集》卷九，423页。
㉟魏象枢：《与孙退谷先生书》，《寒松堂全集》卷九，424页。
㊱王崇简：《光禄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孙公承泽行状》，《碑传集》卷十，《清代碑传全集》上册，58页。
㊲李光地：《孙北海五经翼序》，《榕村全集》卷十二，4页，乾隆元年刻本。
㊳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104页。
㊴引自吴光酉等撰、褚家伟等点校：《陆陇其年谱》，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㊵计东：《中宪大夫内国史院侍读学士曹公本荣行状》，《碑传集》卷三十四，《清代碑传全集》上册，226页。
㊶计东：《中宪大夫内国史院侍读学士曹公本荣行状》，《碑传集》卷三十四，《清代碑传全集》上册，227页。
㊷计东：《中宪大夫内国史院侍读学士曹公本荣行状》，《碑传集》卷三十四，《清代碑传全集》上册，226页。
㊸全祖望：《陆桴亭先生传》，《碑传集》卷一二七，《清代碑传全集》上册，635页。
㊹雷鋐：《张先生履祥传》，《碑传集》卷一二七，《清代碑传全集》上册，636页。
㊺全祖望：《应先生撝谦神道碑》，《碑传集》卷一二八，《清代碑传全集》上册，641页。
㊻彭定求：《朱先生用纯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二八，《清代碑传全集》上册，642页。
㊼《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二，第4册，309页。
㊽《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七，第4册，373—374页。
㊾《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九，第4册，398页。